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叶圣陶

YESHENGTAO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叶圣陶代表作

李景彬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叶圣陶代表作

李景彬 编 责任编辑 曲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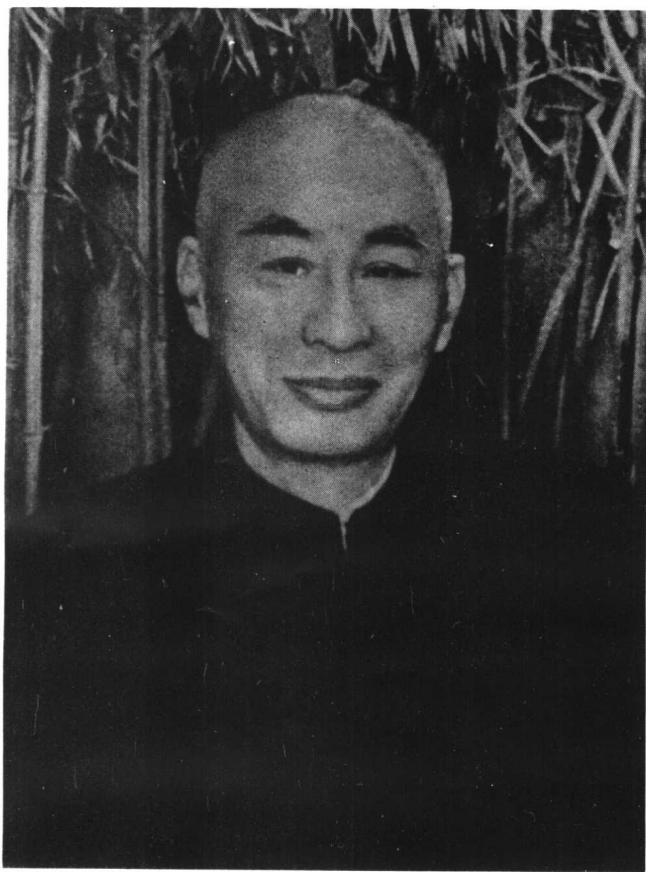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1 字数 276000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293

ISBN7-215-01450-9/I · 91 定价 8.65 元



作 者

莫文也是诗

集丰富而对创作之以严肃的态度，到年底
高自己写成作品的，前几年有矛盾的《子夜》，今年
有西周的《日出》，这两部作品都不是“竹子”所得
之“即兴之作”，而是一刀一凿都不苟且地雕刻成
功的群像。

“太阳升起来，黑暗留不住雨，但是太阳不是
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那篇小说里的歌词大可作
为《日出》的题诗。如果单凭这个意象，那没有
什么新奇，现在有许多小诗，这都是这个意
思，中国具体的工笔不老少，对读者也就淡薄了。影响
这句歌到本却能从具体的事象中透露出意味
来，杨柳青作者自己并没有什么主张，然而读者似乎一
看就到第四章，自己会悟出一番，真有文字语言的
意图，具有这样效果的，作品的诗情是很难得见
也是诗。

凡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今年十月二十八日，是叶圣陶先生九十一周岁寿辰。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寿星在已往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为我国现代文化教育史留下了开拓者的光辉业绩。他的经久不衰的作品，就是这光辉业绩的实录。

一八九四年，叶圣陶出生在江南历史名城苏州悬桥巷的一个帐房先生家里。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危亡促使他与祖国患难与共，贫困拮据的家境又使他同社会下层人民休戚相关。

叶圣陶的童年，以他的聪颖和勤奋，从封建私塾的教育中系统扎实地接受了古代正统文化；至于古代俗文学及民间文学方面的知识欠缺，他又利用课余时间从说书人那里得到了弥补。此外，得天独厚的家乡园林艺术还给他这个喜欢游玩的儿童以美的陶冶。缪斯之神将这一切调合起来，培养着他对文艺的兴趣。

叶圣陶的童年正赶上新学兴起，他的创作就是在新教育的土壤中萌芽的。这个学业成绩优异的少年仅上了一年小学，便跳级考入了苏州公立中学（草桥中学）。叶圣陶在草桥中学读书的五年中，曾与几个学友组织“放社”，创办《学艺日刊》。他所作的《艺兰要诀跋》就发表在《学艺日刊》上，这可以说是他七十余年文学生涯的源头。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这个刚满十七岁的青年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为了向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表示

决绝，他请先生把“秉臣”这个名字改为绍钧，号圣陶。从此，这个思想敏锐的青年便不断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时期，他因家境窘困，读完中学便去教小学，开始了他教育家的生涯。从一九一二年春天开始，叶圣陶连任十年小学教师，又在五所中学、三所大学教过书。值得提出的是他一开始便把执教与创作结合起来，将文学家的生涯与教育家的生涯合而为一，这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要数他最为典型了。但是，在那个名为民主共和实为封建专制的时代，叶圣陶在迈出他人生道路的第一步时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他自己文艺上的才具既不能发展，教育上的意见又不能见诸实行”，为此，他“精神上苦痛极了”，于是就想“丢开教师，投身做工匠去”（顾颉刚：《隔膜·序》）。他既不肯靠教书糊口、借创作遣兴，因此也就不把教书和创作看得比做鞋匠高贵。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他青春时期的愤懑与苦恼。

然而叶圣陶明白，无论是教育还是文艺，都不能超尘脱俗。因此，他在一九一三年七月写成的第一首诗《游拙政园》中，就从与世隔绝的美妙的自然中跳出，去暴露袁世凯统治下那种“白日妖霾现，杀人弃沟壤”的黑暗现实。一年后，他在公开发表的文言小说《穷愁》中，仍然涉笔于社会的腐朽和人生的苦难。如果说这篇描写一个卖饼孩子的穷苦生活的习作还是有意摹效华盛顿·欧文的笔趣的话，那么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发表在《新潮》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后改为《人生》），则是他独出心裁的创作了。这既是他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起点，也是他力行“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开端。一九一九年三月，叶圣陶加入了刚刚由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我国第一个青年文学社团“新潮社”。在新文学拓荒时期，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新

湖社中，“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而在这批文学新秀中，鲁迅尤其看重叶圣陶，认为他会“有更远大的发展”（《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叶圣陶在他从事新文学创作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九——一九二九）中，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辛勤开拓者的深刻印象。其间，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九二一年。这年的一月，叶圣陶以一个新进的现实主义文学弄潮儿的姿态，列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中。我们从他在这年三月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连续发表的四十篇《文艺谈》和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更自觉地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一九二一年，是叶圣陶创作繁荣时期的开端。就在这一年他连续发表了近百篇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还有那独树一帜的童话。这位既具有创作热情和探索精神，又具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年轻作家，将他那枝开拓者之笔伸向了新文学创作的每一块园地。

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九二二年三月，继郁达夫的《沉沦》之后，叶圣陶奉献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隔膜》。同年一月，“五四”以来八位诗人的合集《雪朝》已先行问世，集中选有叶圣陶新诗十五首。接下来，叶圣陶的《稻草人》，作为我国第一本童话集，也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出版。一年后，叶圣陶又和俞平伯出版了散文合集《剑鞘》。直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叶圣陶的创作达到了高峰。长篇小说《倪焕之》的诞生，可以说是在新文学运动史上完成了“划一时代的”“扛鼎”的工作”（夏丏尊：《关于〈倪焕之〉》、茅盾：《读〈倪焕之〉》）。

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倪焕之由个人奋斗到参加党领导的群众

革命斗争的经历，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思想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它以成功的现实主义描写，驱散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迷雾，给当时仍在人生的歧路上徘徊的知识分子展示出投身于时代壮潮中去的光明前景。《倪焕之》的语言简炼朴实，人物刻画细致生动，情节发展自然可信，在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由于作者未尝亲历革命斗争的生活，所以对革命活动及革命者王乐山的描写，都不免流于简单化、概念化。然而这些不足之处毕竟是白璧微瑕，并不能遮掩它在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开创时期所放射的熠熠光彩。关于《倪焕之》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茅盾在这部小说出版时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城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读〈倪焕之〉》）

从“五四”经“五卅”到“四一二”，叶圣陶在创作丰收的同时，逐步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人生观。早在“五四”运动前，叶圣陶就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每期必购，每篇必读，如饥似渴地从中吸取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因此说，他在“五四”时期就已表现出革命民主主义以至主观社会主义的某些特点了（“主观社会主义”的提法见于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比如对教育的开发和妇女解放的问题，他认为绝不能从这些问题本身去寻求解决方法，而应联系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改造去考虑。他指出：要真正解决女子的人格问题，就

“要把社会上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改革一番”（《女子人格问题》）。他指出：只有“打破”“资本制度”，“人类方才有合理的生活，社会方才有真实的进化”（《职业与生计》）。叶圣陶在“五四”时期思想发展所达到的彻底否定旧世界的高度，使他的创作当之无愧地列入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辉煌的革命现实主义一边。“五四”运动还给叶圣陶带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不仅使他创作出大量思想新、内容新、形式新的好作品，而且还鼓起他向新文学的广阔领域竭尽开拓的勇气。

但是，“五四”时期，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类之爱的观点曾使许多人沉醉于一种迷茫的幻境中，叶圣陶也受到了影响，当时他信仰爱的哲学。茅盾后来从他的《隔膜》中看出“‘美’和‘爱’就是他对于人生的理想”（《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叶圣陶的好友顾颉刚也曾用这样的话来描绘他所想象的“人心”：“人心本是充满着爱的，但给附生物遮住了，以致成了隔膜的社会，人心本是充满着生趣和愉快的，但给附生物纠缠住了，以致成了枯燥的社会。然而隔膜和枯燥，只能在人事的外表糊得密不通风，却不能截断内心之流”（《火灾·序》）。然而严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向他证明：“人心”并不都一样地“充满善爱”、“充满着生趣和愉快”，那萦回于人们之间的“内心之流”也并不存在。在“五卅”惨案中，他就亲眼看见了“白边帽子打散了青布大褂”，“枪弹钻进穷光棍的身体”的血的事实（《太平之歌》）。于是他开始分清了敌我营垒，果断地站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一边，声援工人罢工斗争，谴责大资本家的卖国行径。

“五卅”惨案后，叶圣陶的革命意志没有减弱，他不顾被反动当局指为“赤化”的危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

济难会主编机关刊物《光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期间，叶圣陶和郑振铎、胡愈之等人组织了“上海著作人公会”与之配合，并参加了起义成功后建立的上海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后被派到苏州接管学校。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将数以万计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投入血泊之中，这对广大知识分子是一次极其严峻的历史考验。如鲁迅当时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关于知识阶级》）。叶圣陶就是“真的知识阶级”的一名光荣的代表。在反革命屠杀面前，他没有畏惧和动摇，在所有“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鲁迅：《马上日记之二》）的文艺家中，他第一个以小说为武器揭露和控诉了那还在挥舞屠刀的刽子手。他的著名短篇小说《夜》，就是当时革命文学的典范之作。

叶圣陶在从事新文学创作的第二个十年（一九二九——一九三九）中，作品的数量虽然明显地减少了，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叶圣陶创作的这一新的发展趋势，恰恰适应了新文学园地由拓荒转向精耕的历史要求。以小说而论，《四三集》中所收各篇选材之严、开掘之深、思想倾向之鲜明，都超过了已往出版的五本短篇小说集中的大多数作品。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构思也更见得精妙，结构也更见得谨严。朱自清曾指出：

“圣陶写对话似不顶擅长”（《叶圣陶的短篇小说》）。但在叶圣陶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却不是这样，人物对话不再显得呆板，并且也没有先前那种说教气了。我们对照他先前的小说来读一读《多收了三五斗》、《寒假的一天》和《一篇宣言》等作品，是不难体察到这些进步的。再以他的童话而论，《古代英雄的石像》中所收各篇在写法上也比过去显得成熟。

叶圣陶创作的第二个十年正值左翼文学运动兴起的时期。他按照当时上海文艺界党组织的要求，未加入“左联”，为的是更有利于将大批进步作家团结在“左联”周围，从而积极支援左翼文学运动。在这方面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他联合夏丏尊、周建人、郁达夫等二十余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出版机关刊物《文化通讯》。“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叶圣陶又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和鲁迅、茅盾、郁达夫、周扬等四十三人共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二月八日，上海著作家集合讨论组织中国作家抗日会，叶圣陶被推举为委员。总之，不论在新文学运动中和民族解放斗争中，叶圣陶都是站在前列的一名坚强战士。

叶圣陶创作道路的第三个十年（一九三九——一九四九）经历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前一阶段，他过着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争发生后，叶圣陶离开上海，经由苏州、杭州、武汉，于一九三八年秋辗转入蜀。他在四川居住的七年中，八易寓所，生活极不安定。动荡的生活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动荡。这表现在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认识上。

“四一二”政变后的反革命“围剿”，曾使他对国民党政府感到绝望，后因抗战形势所迫而促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又使他将这绝望转变为希望。但由于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革命，所以在动荡的年月里，在血的事实面前能够从本质上及时认清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这一认识上的变化对于他在抗战胜利后旋即投入反蒋的民主运动具有决定性作用。

叶圣陶在动荡的生活中仍抓紧时间写作。写作的内容大致有三：一是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二是撰写文学评论，三是创作短篇

小说。到了抗战胜利前夕结成了《西川集》出版。这几年，他创作的小说虽然数量极少，但都是艺术精品，在技艺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中以《春联儿》一篇为上乘。这五篇小说都着力刻画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正面人物，洋溢着坚信抗战一定会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

叶圣陶这几年的诗作甚多，后来收进《箧存集》的就有三十余首。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活动荡、工作繁忙，宜于利用点滴空隙挥毫急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如常言所说“慷慨多悲歌”的道理罢。这一曲曲慷慨悲歌并非是感叹个人乱离愁绪，它们所表达的是诗人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强烈的恨。

抗战胜利后，叶圣陶于一九四五年末便携带家小冒着风险乘木船自重庆穿三峡东下，于翌年二月四日抵达阔别八载的上海。抗战胜利后的蒋管区，革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是从争自由、争民主开始的。这段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散文创作上。这百余篇文章多是针对性极强的时事评论和杂感。其思想之深刻、文风之泼辣、语言之犀利、形式之灵活，皆非前作所能比拟。他的小品文也别开生面，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大肆逮捕爱国民主人士。叶圣陶的名字也被列入反动派的黑名单里。为了保障他的安全，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请他经香港转到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叶圣陶等人从香港坐轮船北上，由烟台转到北京。他出席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始以一名卓有影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的身份参加了国家文教事业的领导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继续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作。三十多年来，他留给我们的作品大致有《小记十篇》中的散文和《箧存集》第三辑的诗歌，以及其他一些杂文和儿童文学

作品。此外还有一九五四年四月创作的短篇小说《友谊》。叶圣陶这些为数不多的晚年之作是值得我们特别珍爱的。因为这不仅可以使人看到一位年事已高的前辈作家在十分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利用有限余暇为文学事业所做的贡献，而且还可以使人看到在作者那苍劲的笔触下面跳动着一颗热爱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庆贺亿万苦难同胞翻身解放，渴望祖国日益昌盛，人民永远幸福的赤子之心。

在叶圣陶的整个创作中，以小说的成就最大。他早期小说的思想倾向，大致可以用《隔膜》和《抗争》这两篇的题目作一概括，即从对不合理的现实感到“隔膜”到为改变这一不合理的现实而奋起“抗争”。“隔膜”时期的《隔膜》、《火灾》、《线下》三集中的五十一篇作品，主要是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像遇事惊惶，事后便复归于麻木的潘先生（《潘先生在难中》），还有那个虽想改变恶劣的环境却又屈服于习惯势力压迫的小学校长叔雅（《校长》）等等，都是一些不敢抗争、无所作为的生活中的懦弱者。与此同时，在尖锐剧烈的阶级对立中，作者也还看到了社会关系中更主要的一方面。于是在他的笔下不仅出现过当牛做马苦度人生的农家妇女（《一生》），而且还出现了“惯用硬功”索租逼命的狠心地主邵和之（《晓行》）和用敲骨吸髓手段克扣穷教员薪饷的学务委员（《饭》）。然而作者并不真正理解他所反映的这一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悲剧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冷淡所造成的。只有实现人类之爱才能挽救颓败的世风。于是，温和的人道主义便成为他早期作品的思想基调。转而迸发出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火花的，是《城中》和《未厌集》中的十九篇作品。像《城中》里的丁雨生、《抗争》里的郭先生，就是告别了灰色的人生的代表。

他们是有理想、有作为的新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丁雨生为达到从改造教育入手进而改造社会的目的，在流言与恫吓面前不动摇，执着地前进。郭先生则更进了一步，他不象丁雨生那样单枪匹马地硬闯，懂得了要“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出路”的真理，于是他发动起广大教师实行同盟罢教。从“隔膜”转为“抗争”的分界恰好在“五卅”运动中。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严峻现实驱散了作者头脑中“爱的哲学”这个美丽幻影。此后，叶圣陶便在“四一二”的白色恐怖中写出了《夜》这样的革命作品，其“抗争”的精神更加分明。总之，无论是“隔膜”还是“抗争”，作者都是同样冷静而客观地谛视人生、反映人生，表现出一种审慎的现实主义风格。

至于叶圣陶小说人物形象的丰富鲜明、构思与结构的新巧简洁、语言文字的生动简朴等艺术特点，都非三言两语所能阐明，有心的读者不妨自己去细细体会吧。

在叶圣陶的创作中，成就稍逊于小说的，要算是他的散文了。散文最能反映出作家本人的思想性格、志趣爱好和生活经历。叶老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和文学编辑工作，写作极为认真。他的散文给人以扎实谨严、一丝不苟的深刻印象。他把自己的散文喻为“木炭习作”，足见他写作时的审严。郁达夫在编辑现代十六家散文的合集时指出：“我以为一般的高中生，要取作散文的模范，当以叶绍钧氏的作品最为适当。”（《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叶圣陶是我国现代第一位童话作家。他“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表·译者的话》）。叶圣陶的童话创作以《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两集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他前期的童话发自人道主义的深心，传播了“爱”、